



传统的移植

——香港书法研究 (1911—1941)

The Transfer of Traditions:
A Study of Hong Kong Calligraphy (1911-1941)

陈雅飞 著

传统的移植

——香港书法研究 (1911—1941)

The Transfer of Traditions:
A Study of Hong Kong Calligraphy (1911-1941)

陈雅飞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的移植：香港书法研究：1911~1941 / 陈雅飞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308-14868-9

I. ①传… II. ①陈… III. ①汉字—书法史—研究—香港—1911~1941 IV. ①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0367 号

传统的移植—— 香港书法研究(1911—1941)

陈雅飞 著

责任编辑	殷 尧(yinyao@ymail.com)
文字编辑	吕倩岚
责任校对	邵吉辰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92 千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868-9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香港书法的前奏	4
第一节 王 韬	5
第二节 潘飞声	9
第三节 流寓文人	15
第二章 遗老与传统书法	19
第一节 来自广东的遗老	19
一、延续传统的途径	19
二、旧式的文人交游圈	25
第二节 传统文学的延续	28
一、宋台秋唱(民初)	29
二、学海书楼(20 世纪 20 年代)	31
三、正声吟社(20 世纪 30 年代)	33
第三节 遗老书法的流播	37
一、民间的铭刻招牌	37
二、商人的交往应酬	38
三、市场的鬻书谋生	42
四、文人圈的翰墨来往	45
第四节 太史公体	46
一、帖学书风	46
二、馆阁面貌	50
三、篆籀与章草	51

第三章 文人书画圈	56
第一节 文人南下与新旧交替	56
一、遗老淡出	56
二、文人南下	61
第二节 蔡守、邓尔雅与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	65
一、蔡守和邓尔雅	65
二、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	69
三、粤港沪书画圈的萌芽	75
四、代表书家	79
第三节 杜其章与香港书画文学社	83
一、杜其章	84
二、香港书画文学社	85
三、非非画报社	93
四、保存国粹与新旧共存	97
五、粤港沪书画圈的发展	101
六、代表书家	105
第四节 叶恭绰与中国文化协进会	107
一、叶恭绰	107
二、中国文化协进会	109
三、粤港沪书画圈的合流	124
四、代表书家	126
五、余论	129
第四章 从精英走向大众	131
第一节 雅 集	131
一、樟园雅集和愉园雅集(民初)	131
二、北山诗社和南社湘集(20 世纪 20 年代)	134
三、社团雅集(1926—1941)	141
第二节 展 览	148
一、发轫期(清末民初)	148
二、第一次高潮(二三十年代之交)	151
三、第二次高潮(三四十年代之交)	158
第三节 教 学	161

一、书法教学	161
二、书法比赛	172
三、专门的书法教育	174
第四节 书画市场	186
一、笺扇庄和书画店	186
二、美术与实业	188
三、书法润例	190
四、书画赈灾	193
结 语	198
一、人才迁移	198
二、地域因素	201
三、碑帖传统	203
四、保存国粹	205
图版说明	215
图 版	231
参考文献	384
附录一 20 世纪上半叶香港书坛人物小传	420
附录二 20 世纪上半叶香港书坛人物生卒籍贯简表	433
后 记	439
鸣 谢	440

引 言

自 1841 年至 1997 年,无论晚清、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香港虽然政治上脱离中国管辖,但从文化层面而言,一直与中国传统密不可分。香港的书法,一如文学、绘画等,是研究近现代中国艺术史不可忽略的部分。“九七”回归后,香港人本土意识兴起,身份认同日益强化,以往忽略的香港文化史受到关注。然而,相对于文学与绘画,香港书法的研究较为缺乏,其中有关 1941 年前的部分,因史料难觅,尤少学者专门探讨。^①

在近十年的中国书法史研究中,民国时期是不少学者致力开拓的范围,并颇见成绩。20 世纪上半叶的香港书法,在时间与传统上可归于民国书法的范畴,但由于香港本身独特的政治因素,也因香港书坛缺乏开宗立派的大师,以往有关民国书法的研究,未曾将香港纳入。有鉴于此,探讨此一时期的香港书法尤为必要。这可从几方面做出观察。

其一,从香港艺术史的角度看,反映出精英艺术在香港植入及发展的过程。相对于内地,香港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庇护之所。不单经学、文学、绘画等随着人才南迁而移入,书法也成为传统中国艺术在全新的地域扎根。中国历史上,人才迁移影响到艺术移植不乏其例,1911—1941 年的香港书法正可作为个案,以此了解传统迁移的肇始、发展及相关问题。

其二,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变革阶段,传统文化备受挑战。中国书法于西方没有对应的艺术类型,并未像绘画般针对改良而引起巨大论争。然而,从传统社会步入新的城市结构的过程中,作为国粹的书法如何发展,将是饶有意义的课题。香港的社会及经济发展异常迅速,不少西方的商业及社会机制,于 1941 年前已具规模。面对新的社会结构,香港早

^① 有关香港书法的专门研究并不多,与早期史料湮没有关。最早而较详尽的是马国权:《香港近百年书坛概述》,莫家良编:《书海观澜——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文物馆,1998 年,第 189~271 页,该文以书家传记形式撰写。

期书法如何面向公众,贴近社会,是近现代书法史的个案。

其三,中国书法背后的人文道德价值,例如人品、修养、学问等,是古人论书的标准,但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往往有其独特含义。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民国的香港文人,无论是较早的逊清遗老,还是其后陆续南下的学者,大都为延续传统、保存国粹而努力;在广州陷落时,更视保存乡邦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为责任所在。香港书法一向被视为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即使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也不例外,^①究其渊源,与战前书家视书法为国粹和民族精神的观点不无关系。

传统撰写书法史,离不开书家、书迹与书风,其中尤以书坛巨擘及其书艺成就为焦点。1911—1941 年的香港早期书坛,如邓尔雅、叶恭绰、冯师韩、简经纶等,并非开创时代风气的宗师,但若从文化方面观之,则不无意义。寓港书家背景和渊源各异,其书法活动往往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例如雅集、诗社、展览、出版等,加上与广东及中原地区的联系,构成了香港早期书法复杂的文化景观。因此,要了解 1911—1941 年的香港书法,需从相关的文化情境入手,突出书法艺术与整体文化氛围的关系。与此同时,个别重要的书家或书家群,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重要文化团体中具有代表性,宜重点讨论,除分析其书风外,也探讨书法活动中的角色,以为其贡献做出应有观察。

要探讨 1911—1941 年的香港书法,须归纳出核心论题作为重点,否则无以突出香港书坛的主流现象。在渊源上,清末的香港书坛未成气候,但其间以王韬、潘飞声为中心的文人圈,加上一些流寓香江的文人,为香港留下了传统精英的墨迹,本书以此作为香港书法的前奏。1911 年后的三十年,香港书法可分三个主要论题。首先是逊清遗老的南移及其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包括酬唱雅集、崇尚经学、推动文学等,而其所引入的“太史公体”书法,也是讨论焦点。其次是遗老以外的文人及其活动与书法,涉及三个重要团体,即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香港书画文学社、中国文化协进会,分别以蔡守、邓尔雅、杜其章、叶恭绰为核心。这些团体的发展构成二三十年代香港艺坛的景象,其中书法与绘画、文学并行,于碑学与帖学书法的自由选择下,呈现出多样风格。最后是香港书法所展现出的从精英走向大众的

^① 对于香港书法保持更多传统品格的论点,见万青力演讲,《第八届书法联展特刊》,香港,香港国际书法联盟,1999 年。至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香港书法,可参考莫家良:《从传统到现代——香港艺术双年展书法的思考》,莫家良主编:《香港视觉艺术年鉴 2005》,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3~79 页。

现象,可从雅集、展览、出版、教育、鬻书等活动中了解,反映出中国书法从传统步入现代社会的方式。这些论题所涉内容相互关联,但贯穿其中的有人才迁移、地域因素、碑帖传统、保存国粹四个要点,将于本文总结中有所阐释。

中国书法史学界倾向于认为,书家是否代表时代精英、作品意义是否积极向上等,是书法的重要评价标准,因此对作品的描述或书家创作动机的剖白较多着墨。在好与不好的评价体系中,地域书风和边缘书家的研究被忽略,保守书风不值一提,远在海隅的香港书法备受冷落。但若将其置于整体文化脉络中,则传统或保守是文化现象的折射,书法传统的移植更是文化迁移的范例。本书即关于传统移植的研究尝试。

第一章 香港书法的前奏

若以文字遗存作为渊源,香港书法的历史可上溯至九龙李郑屋村东汉古墓中的砖文,或鲤鱼门北佛堂的南宋摩崖石刻。然而晚清以前,香港未见重要的书法作品,也没有知名书家可列入书史。鸦片战争后,香港移民骤增,文化南播,书法成为香港早期文艺的一部分。因此,学者一般以晚清为香港书法的肇始;或因遗老来港开启风气,以民初作为正式起点。^①本书以晚清作为香港书法的前奏。

香港位于广州东南约 130 公里,是华南地区的重要枢纽。鸦片战争后,《义律晓示》以通商姿态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此举成为香港跃上国际舞台的契机。19 世纪后半期,粤省因人满之患、水灾旱灾而生活困苦,太平天国席卷南中国,粤人为避兵燹而离乡别井,这些人大多是蜑家、苦力、劳工、仆役、小贩和采石工,也包括不少文人。^②19 世纪末,来自日本以至欧洲或美洲东岸的船舶很多以香港为中转站,太平洋两岸的交通也多途经香港,当时以香港为起点的航线有往印度、南洋、菲律宾以及内地沿海都市等。^③它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有密切交往,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④随着港口开发和移民到来,香港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设施,19 世纪 70 年代,黄遵宪、郭嵩焘、康有为等途经香港时,都对此地管理留下了深刻印象(图 1.1)。

晚清的香港书法,不少以碑刻、牌匾、对联等形式保存,这些作品部分

① 如马国权探讨香港书法,即由晚清开始。见马国权:《香港近百年书坛概述》,莫家良编:《书海观澜——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8 年,第 189~274 页。至于以遗老来港作为香港书法的肇始,参见莫家良:《香江先贤墨迹——文化承传与书法》,《香江先贤墨迹》,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2007 年,第 15~24 页。

② 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0 页;吴伦霓霞:《香港反清革命宣传报刊及其与南洋的联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 年总第 19 卷。

③ 参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香港事情》,东京,1917 年,第 107~124 页。

④ Fok Kai-cheong, "Private Chinese Business Letters and the Study of Hong Kong History—A Preliminary Report," *Collected Essays on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1990, p. 14.

出自广州和邻县宿儒之手,如1875年潘士钊为坑口天后庙题写“天后古庙”,1876年潘正亨为油麻地天后庙题写“天后古庙”,1882年陈维岳为大角咀天后庙题匾,1896年邓蓉镜为油麻地天后庙题写“福德鸿恩”等,以及康有为、苏若瑚(图1.2)1896年为保良局落成所撰楹联等,不一而足。另外也有本地擅书者,如新界乡村大族厦村人邓惠麟和元朗人伍麟昌、伍凤昌兄弟,三人以诗文书法驰誉乡里。1883年前者为邓氏宗祠友恭堂落成撰联并书“税院流芳”匾额,伍氏兄弟则分别为元朗十八乡大树下天后庙撰书《新建文武二帝庙碑记》和《重修天后庙碑记》。^① 这些踪迹都显示了早期书法在香港的留存,但于香港早期书坛更具意义的,应是晚清流寓文人的书法,当中以王韬和潘飞声为著。

第一节 王 韬

王韬(图1.3)是江苏长洲人,早年任上海英国教会所办的墨海印书局,因上书太平军献策为清廷通缉,1862年10月11日流亡香港,至1884年离港返沪,除一度侨居英国,前后居港二十年,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贡献卓著。^② 他勤于笔耕,先任职香港墨海书馆,为英华书院校长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经典,后任《循环日报》主笔。19世纪下半叶的香港对乡族观念、伦理纲常、传统节日等保留甚多。现存两张照片可见当时景象(图1.4—1.5),其人物衣着、街道招牌,以及厅堂内的书画挂轴,都显示出中国传统习俗无处不在。王韬于1865年写道:

港中居民之寄居者,虽咸守英人约束,然仍沿华俗不变,不独衣冠饮食已也。如崇神佛则有庙宇,祀祖先则有祭巷,正朔时日,无一不准诸内地。元旦亦行拜贺礼,爆竹喧阗,彻于宵旦。令节佳辰,欢呼庆赏。每岁中元,设有盂兰胜会,竞丽争奇,万金轻于一掷。^③

^① 马国权:《香港近百年书坛概述》,莫家良编:《书海观澜——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8年,第189页;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霞合编:《香港碑铭汇编》,香港,市政局,1986年。

^②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55页。关于王韬在港交游,详见周佳荣:《在香港与王韬会面——中日两国名士的访港记录》,林启彦、黄文江主编:《王韬与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0年,第375~394页。

^③ 王韬:《香港略论》,《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7~149页。

在此环境中,王韬旅港生涯并不寂寞,所交往的有同事黄胜、陈蔼亭、洪干甫、胡礼垣,友人屈烟山、包榕坊,以及任职于西人义塾(俗呼为皇家馆)的张惠生等。^①王韬位于鸭巴甸街的寓居“天南邈窟”成为南来文人的交流之所,他的女婿钱征(听伯)记载了自己1873年到访邈窟的情景:“几上书籍,鳞次纷积约寸许,秃笔数十支,颠倒横陈于故纸中。”^②光绪七年(1881)途经香港的吴广霈也详载了拜访王韬寓所的场景:

紫詮遂小制盘飧,呼樽留饮于其天南邈窟中。楼高百尺,极目烟波,遥天云物,尽入杯罍,奇人奇境,一时交值,能勿快哉。相与抵掌雄谈,立倾巨爵。饭已,获观其藏书,延壁作橱,上椽下板,度架殆满,颇有异本,且多海外秘籍,遐陬逸史,为中国文人博士皓首所未睹者,邈叟乃独得而寝馈之,著作之富,曷足为怪,壬秋慧业,定于斯矣。^③

此行中,王韬与马建忠、吴广霈雅集于杏花楼,有即席赠答。一个月后,马、吴归国抵港,王韬为之接风于曲院,高楼三层,颜曰“绮交绣错之楼”,灯火连宵,笙歌彻夜,吴广霈因异方之乐,“殊觉不堪入耳”,留赠一律而别。这类探访寓所和雅集饯行,当时不在少数,后人从这些题赠留别、诗文唱和的记录中,依稀可觅早期来港文人的风采。

王韬嗜好书法,友人中不乏书家,如晚清篆刻家与书法家徐三庚即为其例。现可见徐三庚为王韬所刻的“弢园藏”杂形朱文印,边款为“紫詮老友审之,壬申(1872)中秋,将之五羊城,道经香港制此,上虞徐三庚记”(图1.6)。徐氏长年居沪,此行后南游广州刻印传艺,张嘉谟、张崇光、何瑗玉及尹子新等拜其门下。徐氏在港停留不长,但与王韬情谊的延续有迹可寻,1885年左右,王韬编辑的《蘅华馆印存》所录大部分为徐三庚印作,

① 王韬在致盛宣怀信中描述其日常生活:“闭关静坐,不出户庭,扫地焚香,吟诗读画,聊自消遣而已。”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册,第3382页,手札十三之二。

② 钱征:《〈邈窟谰言〉跋》,王韬:《邈窟谰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吴广霈:《南行日记》,辑入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第10帙,第17页。吴广霈,安徽泾县人,字瀚涛,号琴溪子,义号剑华道人,生卒不详,尝与郑观应交游,曾为郑氏《罗浮待鹤山人诗集》作序与题词,光绪七年(1881)吴广霈跟随时在李鸿章幕府帮办洋务的马建忠出使印度,途经香港时拜谒王韬,《南行日记》由王韬校订、出版并撰序,即吴氏此次出行之日记,起自辛巳(光绪七年,1881)六月二十四日,迄于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详见胡从经:《〈柘园蔓草〉片羽——王韬居港佚文轶事之新发见》,《大公报》1999年8月25日。

后段并附徐氏弟子、日本的圆山真逸刻印,总70页,录印近百方。^①

王韬所在的同治时期是中日关系较好的年代,日人对英华书院颇为心仪,该院作为19世纪后期香港重要的文化场所,深负时誉。市川渡记录了1862年至英华书院拜访英人理雅各和中国人韩福田、何广廷的情况。市川擅长日式(和流)草书,书写教育部(文部省)的习字教科书,书法颇有造诣。他们见面后,市川拿出一帖乞书,理雅各写“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韩福田写“惠风和畅”,何广廷书“扬眉吐气,四海云游”。对他们的书法,市川并不满意,他私下评道:“各人所书均笔力疲弱,运笔劣拙,虽不足他日观,亦可聊慰羁旅之情。”第二日,港绅罗森拜访市川,后者照例乞书,罗写下“诚正中和”四字。市川渡在信中对日本友人抱怨“(香港)当地因为僻远,无文士之辈”,所以挥毫“无可拜托,实属遗憾”。^②这则日记可窥文化交流之一斑,诸人书法未能让日人满意,王韬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王韬与日人交往颇多,1864年,高桥留三郎和金上盛纯随遣法使节团归国经港时拜访王韬,笔谈良久,索诗赠物而去。^③1873年,王韬得张芝轩和陈葛亭相助,将香港西报刊载的消息编译成《普法战纪》,刊行后名震东瀛。日人遂邀王韬于1879年游览东京四个月,其间他结识了栗本锄云、佐田白茂、冈千仞、岩谷一六、藤田茂吉等政界和学界名流,其中岩谷一六是明治书家,冈千仞是杨守敬、张裕钊旧友。冈千仞于1884年与上海龙门书院士子笔谈时,对王韬有如此评价:“先生妙于诗文,敏捷实为无前,而猖狂自肆,自弃于绳墨之外、礼仪之表,甚似晋宋间之人。”^④王韬的《蘅华馆诗录》保留了与日本诗人的诸多唱和,据说日人爱其诗,“所作诗文,辄视同金科玉律”,王韬甚至自称“日东诗祖”,私下向友人说道:“第十指如悬槌,春蚓秋蛇,异常恶劣,而东瀛人颇有嗜痂之癖,每得拙书,如获拱璧。”(图1.7)

王韬勤于挥毫,楹联即为常见形式。1881年初的《循环日报》有《楹联余话》和《赠答楹联》二文,描述了他与陈幼莲、潘峰琴、童子浚、黄秋业等友人楹联赠答的情形:“余虽蠖居于天南遐窟,而四方文士雅流,往来南北者,必道出于此,辱承不弃,赠紈投稿,时有赠答。”从报章所录,有自撰楹联:

① 圆山真逸号大迂、寻常百姓家主人,为日本名古屋人,凤耽染翰,尝游中国师事徐三庚,从现存徐三庚为大迂所刻的“寻常百姓家主人”正文细朱文印可见师徒因缘。大迂为近代日本印坛大师,兼得徐三庚和吴昌硕印风,又好汉文,1895年编有《支那短语数解:附汉话问答篇》,得到明治名流题跋赠序。

② 市川渡:《尾蝇欧行漫录(六)》,大冢武松编:《遣外使节日记纂辑第二》,东京,日本史籍协会,1929年,第554~557页。市川渡访英华书院的时间为1862年2月7日至8日。

③ 陈湛颐:《日本人与香港——十九世纪见闻录》,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5年,第141~142页。

④ 冈千仞:《上海近况》,《邮便报知新闻》1884年5月29日。易惠莉:《中日知识界交流实录——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

“办天下事自欧洲始，通古人书从时务来”；友人赠联：“世外文章藏遯窟，天边踪迹遍欧洲”“海国见闻成外史，边疆谋略重台官”“文人老去还耽酒，绝域归来尚著书”“闭门著书多岁月，挥毫落纸如云烟”“人思虞夏黄农而上，文在屈宋班马之间”等。^①王韬居港最后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更自撰三对挽联：

一棺海外归来，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半世天南容我，枉心肠注砚北虫鱼。

生平所好在载酒看花，负我阿卿惟此事；身后所余仅嗣孤痴女，算来王氏更无人。

生渡海来，伤全家眷属四人，今所存仅山妻而已，同衾卅载，撒手一朝，已怆于心，况不能视我盖棺，雪冷申江，空化望夫之石；死归里去，叹赤手经营半世，家所有独书卷云尔，著述千秋，流传百代，一听之命，又何虑供人覆瓿，云迷碧落，徒怀叩帝之阍。^②

这些对联，相信亲笔手书不在少数，惜书迹难见，无以了解其对联书法的水平。香港中文大学藏有1884年王韬由港归沪后写给盛宣怀的手札73通，起自1884年，止于1897年，展现了王氏日常书写的行书面貌（图1.8—1.9）。大体而言，其行书不全以二王尺牍为宗，提按转折常有重笔，结体间作扁平欹侧之态，有东坡风致。信札外，王韬的日记书迹风格相类（图1.10）。至于《淞隐漫录》序言，则是传世较少的小楷，用笔方折平整，结体亦方，个别笔画如钩捺皆直接拉出，是典型的魏碑风格（图1.11）。^③另据载，王韬在游览伦敦时应友人之请，写了四行字模仿《灵飞经》以装饰厅堂，又可见其对唐代秀丽的写经书法有所涉猎。^④

王韬在港二十年，作为传统士大夫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者，他以诗歌、书法、出版带动了香港的文化气息，而他在英华书院与理雅各的合作，乃至与日本学界的交往，可证早期寓港名士对香港文化界做出的贡献。

① 王韬：《赠答楹联》《楹联余话》，《循环日报》1881年1月11日，1881年2月2日。

② 王韬：《鸣鸟遗音》，《循环日报》1881年12月30日。

③ 关于王韬信札，除文中所及，笔者所知还有香港信义宗神学院的李志刚教授藏有王韬晚年致理雅各的五封信札影印件，得自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校牧刘子睿博士，分别作于1881年、1891年、1892年、1894年、1895年。

④ 王韬：《漫游随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第11册，第555～556页。

第二节 潘飞声

王韬离港返沪后的第十年,即1894年,广东文人潘飞声(图1.12)来港,居住十三年后返粤赴沪,期间寓居九龙,所居“在山泉”。^①潘氏出身广东名门,作于来港前一年的印拓“闽粤世家”表达了他“勿堕家风”的期许(图1.13)。他原应香港中华报馆之聘来港,后转任《华字日报》《实报》主笔,在诗歌、交游和书法等方面为香港增添文化气息。

潘飞声交游极广,晚清名士朱祖谋、黄遵宪、丘逢甲、邱菽园等过港时,与他均有唱和。他在港期间作有《香海集》(图1.14),所涉知交有黄节、邱菽园、冒广生、尹困、伍德彝、居廉、金继、高翀、张在初、姚文栋、杨葆光、萧伯瑶、杨永衍等。李东沅在序中称赞道:“(兰史)香江载酒,闲称寓公。沪读刊诗,群疑老宿。环球知其姓字,名山藏其箬书,时贤早标四子之称。”梁清跋云:

丁亥(1887)春,旅食香海。香港故繁盛区,黄尘高于马首。居是邦者,多富商巨贾,贸易而外,只可事征逐,醉花酒。而欲于软红十丈中,求所谓骚人畸士者,查不可得。会先生自海外归,方闭门著书,研究经济有用之学。……间尝出其余绪,著之歌咏,摇笔五岳,振奇百家,每出一篇,争相传诵。由是知骚人奇士,乃有先生其人者,香海而有先生,香海其不俗矣。先生之集以香海名,香海盖可传矣。^②

在《香海集》中,潘氏响应黄遵宪和丘逢甲“诗界革命”的口号,以振兴晚清诗坛为任。丘逢甲力赞其诗开辟意境:“归来香海修诗楼,山人说剑楼上头。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刀横绝东西球。”^③潘飞声的《在山泉诗话》是香港第一本诗话,连载于《华字日报》1905年至1906年的“广智版”上,1908年潘飞声离港时曾作《诗话告竣》挥别友朋,以为尾声。^④

潘飞声不以书名,但风流蕴藉,颇得时誉,曾鬻书香港以助酒资,1906年的《有所谓报》刊登了郑贯一、陈树人代订的《老兰酒润》(图1.15):

① 潘飞声此前曾到港两次,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十六年(1890)分别往返德国时,短暂经港访旧。程中山:《论潘飞声〈香海集〉》,《文学论衡》2004年总第5期,第3页。

② 李东沅序,梁清跋,潘飞声:《香海集》,光绪廿四年(1898)广州仙城药州刻本。

③ 丘逢甲:《说剑堂集题词为独立山人作》,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岭云海日楼诗钞》,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74页。

④ 《诗话告竣》,《华字日报》1908年8月20日。

潘兰史先生《示姬人》第三首云：佣书早倦十年游，彩笔江湖未肯投。不数旗亭同画壁，先教红袖定千秋。自注云：余不工书，多有以扇子尺页求书者，每以为劳。姬笑曰：人重君诗，非重君书也。余为解颐云云。其实先生书高逸圆厚，书味盎然，固不为诗所掩，自来香海，求者益众。仆为代订润笔例，团折扇每把二百文，绢纸册每页四百文，此例甚廉。盖先生不欲多取于人也，只助酒费而已。乙巳冬十月。

该报上当年出现了七八次酒例，可见“求者益众”之况。潘氏擅长行楷，1903年的《行书七言律诗》(图 1.16)和 1909 年致香港绅商陈子丹的《行书信札》(图 1.17)用笔劲挺，结体略为修长，间见丰腴笔画和微挑捺笔，以及略呈跌宕欹侧的字形，风格承自东坡，与王韬不谋而合，反映出传统文人对东坡的敬重。1929 年的《行书四屏》(图 1.18)通篇论东坡诗书，认为“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以后一人”。其他传世尺牘中，点画间除近苏轼外，亦带有米芾书法的俊逸神采，其中扇面《行书论唐代书法》写道：

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分隶，涵抱万有，则前惟渤海，后只鲁公，非虞、褚诸子所能颉颃也。此论非深于篆、分、真、草源流本末者，固不能一信。都尉书道因碑，逼真家法，握拳透掌，模之有棱，其险劲横轶处，往往突过乃翁。所谓智其师，乃堪传授也。何道州语。

此语虽出自何绍基《跋道因碑旧拓本》，亦代表潘氏认同的书法见解。此扇面得东坡体势，但用笔较为浑厚，有颜书筋肉厚重之感，与论书内容相表里。

潘飞声居港逾十载，诗文、书艺都颇负时誉，是文人雅集酬唱的核心人物，其交友圈在港留下的作品，可以两幅《独立图》为例。

第一幅是光绪乙未(1895)五月由居廉所绘的《潘兰史像轴》(图 1.19)，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上有姚文栋、邱炜菱(1898)、邱诒桐(1896)、梁澐、桂林、刘霭慈、杨葆光、张德彝、李东沅(1898)、尹困(1896、1897)、李石樵(1896)、李宝森等人题跋，其中两则题跋留下文人雅集的场景，尹困在题写五言律诗后写道：

光绪丁酉(1897)十一月初九日，同人置酒于河南潘氏家庙能敬堂，奉祝老兰先生大寿，即席成诗，附题图侧。